

印尼的結構難題：經濟民族主義

自1990年代印尼伊斯蘭教的中產階級興起，排斥華人的言論與行為更為增加。這是因為大部分的伊斯蘭教徒認為在這一波經濟成長中，受益的只有華人。而且這批以現代主義為背景的伊斯蘭教中產階級，逐漸對政府偏好華人與基督徒感到不滿。在經濟與宗教的雙重社會背景下，土著社會反華的社會情緒，可以被輕易政治動員。（本文為節錄，原文將刊登在信報網站）

不久前因為在競選過程中的一些言論與宗教爭議，印尼首都雅加達前省長、選舉連任的華裔候選人鍾萬學被判罪成入監，世界各地也有許多團體展開聲援活動；與此同時，發動大規模抗議示威、促使鍾萬學因褻瀆宗教被判入獄的伊斯蘭組織的領導人放話，下個目標是打擊經濟不平等和外國投資。

隨着金融風暴後的復甦，近年印尼經濟受到重視，國際經濟學者以「金磚第五國」形容印尼廣大內需市場背後的經濟潛力：每年平均超過6%的經濟增長，近兩億五千萬人口，GDP總額超過東盟十國的一半。印尼是近年整個亞洲新興國家投資熱潮中，重要性最高，也最被看好的市場之一。在新南向的口號下，許多台灣的企業家也看好印尼的經濟，認為印尼有很多天然資源，人口結構年輕，新生代教育水平逐漸提高，將成為東盟地區主要的生產據點，台商開始與印尼業界進行不同的合作項目。例如富士康集團的郭台銘先生就極力推動欲將印尼成為中國以外最大的生產與行銷基地。

另一方面，對於印尼經濟與產業的前景，媒體的分析兩極分化：極富與極貧；近乎無限的天然資源與長期停滯的產業升級；蜂擁而至的外國投資與不斷外流的本地資金；充滿願景的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內閣與積弊難清的地方分贓；印尼是第五塊「金磚」，也是脆弱的第五國。據瑞信研究院2016年全球財富報告，印尼1%最富裕的富豪掌控全國49.3%的財富，是全球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國家。

防止「外國資本」壟斷

在眾多影響印尼經濟發展的政經結構因素中，經濟民族主義一直是重要的影響因子。印尼獨立運動的訴求就是反外國政治勢力與經濟殖民，自獨立後蘇加諾所秉持的就是以經濟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解決印尼經濟結構與社會變遷的問題。在蘇加諾眼中，為使經濟能夠從殖民時期脫胎換骨，必須要發展本土資本，並且要透過工業建設擴展經濟，發展民族工業，不能讓宰制印尼經濟的外國資本壟斷國內經濟。當然這所謂的「外國資本」，包括殖民者與外來的華人。這樣的原則被寫在印尼憲法第33條。

「阿里巴巴」現象

蘇加諾晚年在經濟上更嚴格監管外資公司。這種做法主要是希望透過「土著化」與「民族化」的政策以化解經濟困境。然而這些限制華人經濟活動的政策，並沒有真正使印尼的經濟得到發展，反而使經濟惡化。例如，限制外商與華人經營的「堡壘制」¹，形成所謂「阿里巴巴」（Ali Baba）現象，也就是「土著執照擁有者」（Ali）與「華人企業」（Baba）的商業聯盟關係。

蘇哈托（1967年至1998年任印尼總統）採取的策略是在政治領域禁止以華人身份扮演任何角色，並限制華人文化與教育，阻止華人社會華人化。但是在經濟領域上，其對華人經濟則是採取鼓勵與合作的態度，給予特定商人特權壟斷或政府合約，這樣更助長華人建立政商聯盟的環境。這樣的聯盟關係，就是一種統合的資源分配關係。藉由國家機器「導引」經濟政策，透過軍隊與政府去政治化的系統性保護，對土著菁英（特別是軍隊與官僚），提供租稅減免、進出口特許執照、特定的開放承諾……等資源，參與合作的華人企業則回報以生意機會或直接利益。這樣的「官僚資本模式」（Bureaucratic-Capitalist）是一種由中央到地方，由蘇哈托到地方官員的全面性結構關係，成為八十年代印尼經濟能夠快速資本累積的主因。

可是這種聯盟的關係只是介乎圖利政府與特定的少數財團之間，並不能夠使多數的土著受惠。土著社會對於華人企業利用「阿里巴巴」快速累積財富的現象，充滿敵意和怨恨。因此，在土著社會中一直有所謂的「反華論述」存在。對多數的印尼土著來說，華人由上而下掌控印尼的經濟，對整個印尼並無向心力；華人與政府勾結致富，所以華人也成為貪污腐化的同義詞。

穆斯林中產對華人不滿

自1990年代穆斯林中產階級興起，排斥華人的言論與行為更為增加。這是因為大部分的伊斯蘭教徒認為在這一波經濟成長中，受益的只有華人。而且這批以現代主義為背景的穆斯林中產階級，逐漸對政府偏好華人與基督徒感到不滿。在經濟與宗教的雙重社會背景下，土著社會反華的社會情緒，可以被輕易政治動員。

1998年的5月初棉蘭發生嚴重的反華暴動，延續到5月中雅加達街頭示威要求民主化的大學生被維持治安的軍警打死，引發更大規模的暴亂。在這場被稱為「黑色五月」暴亂中，1200人喪生。在「黑色五月」後，歷經印尼的民主轉型，印尼華人開始可以享受一般國民的平等權益，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與文化，也逐漸在政治上嶄露頭角，在經濟上則繼續保持優勢。不過，儘管印尼自此之後未出現流血的大規模暴力事件，但種族衝突因子仍然存在。老一輩的華人還是有「每二十年一大亂」的陰影，伊斯蘭團體上街抗議還是使華人社群感到不安。

事實上，雖然歷經政治經濟轉型以及面對全球化的開放，外資大量的投入，經濟從金融風暴谷底復甦。中國的興起與「一帶一路」帶來的貿易機會與投資的湧入，結合掌握本土資本的華人，帶動新一批的成長動能。這就是我們今日在印尼各大城市與商場看到的榮景。

可是繁榮背後，還是有大批本土的、多半是伊斯蘭信仰的群眾並沒有因此受惠，1998年前有關排斥華人的言論與行為並沒有因為政治轉型而有所改變；而當代都市中產階級穆斯林訴求安定，也害怕華人與基督徒當政可能帶來的社會失序；中國資金與遊客的大舉進入令他們感到不安。所以鍾萬學雖然政績看好，在第二輪投票中選票仍未有增長，得不到主流伊斯蘭社會的支持而落敗。

就經濟面來看，印尼經濟民族主義依舊是整體國家經濟的重要考量，特別是針對境內的自然資源，印尼政府清楚無法永遠只靠出口低附加價值的原礦支撐國家出口。在繁華背後，印尼的工業發展仍受到不同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例如：印尼是產油國家，石油工業卻被國營石油公司把持而無法使國家富強；印尼有廣大的內需需求，卻無法建立完整的汽車產業供應鏈；燃油補貼政策拖跨國家財政。

（戴萬平教授新著《印尼產業的政治經濟學：資源詛咒》即將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出版，編入「東亞焦點叢書」，該叢書由羅金義主編。）

註1 凡是土著資本超過70%的企業，即是屬於「堡壘商」（Benteng），政府對於這一類的企業應給予「土著特權」（Indigenous Privileges），享受各種的優惠措施，以促進土著企業的競爭能力。

戴萬平 台灣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副教授

環球視野

戴萬平 台灣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副教授

印尼的結構難題：經濟民族主義

自1990年代印尼伊斯蘭教的中產階級興起，排斥華人的言論與行為更為增加。這是因為大部分的伊斯蘭教徒認為在這一波經濟成長中，受益的只有華人。而且這批以現代主義為背景的伊斯蘭教中產階級，逐漸對政府偏好華人與基督徒感到不滿。在經濟與宗教的雙重社會背景下，土著社會反華的社會情緒，可以被輕易政治動員。(本文為節錄，原文將刊登在信報網站)

不久前因為在競選過程中的一些言論與宗教爭議，印尼首都雅加達前省長、選舉連任的華裔候選人鍾萬學被判罪成入監，世界各地也有許多團體展開聲援活動；與此同時，發動大規模抗議示威、促使鍾萬學因褻瀆宗教被判入獄的伊斯蘭組織的領導人放話，下個目標是打擊經濟不平等和外國投資。

隨着金融風暴後的復甦，近年印尼經濟受到重視，國際經濟學者以「金磚第五國」形容印尼廣大內需市場背後的經濟潛力：每年平均超過6%的經濟增長，近兩億五千萬人口，GDP總額超過東盟十國的一半。印尼是近年整個亞洲新興國家投資熱潮中，重要性最高，也最被看好的市場之一。在新南向的口號下，許多台灣的企業家也看好印尼的經濟，認為印尼有很多天然資源，人口結構年輕，新生代教育水平逐漸提高，將成為東盟地區主要的生產據點，台商開始與印尼業界進行不同的合作項目。例如富士康集團的郭台銘先生就極力推動欲將印尼成為中國以外最大的生產與行銷基地。

另一方面，對於印尼經濟與產業的前景，媒體的分析兩極分化：極富與極貧；近乎無限的天然資源與長期停滯的產業升級；蜂擁而至的外國投資與不斷外流的本地資金；充滿願景的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內閣與積弊難清的地方分贓；印尼是第五塊「金磚」，也是脆弱的第五國。據瑞信研究院2016年全球財富報告，印尼1%最富裕的富豪掌控全國49.3%的財富，是全球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國家。

防止「外國資本」壟斷

在眾多影響印尼經濟發展的政經結構因素中，經濟民族主義一直是重要的影響因子。印尼獨立運動的訴求就是反外國政治勢力與經濟殖民，自獨立後蘇加諾所秉持的就是以經濟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解決印尼經濟結構與社會變遷的問題。在蘇加諾眼中，為使經濟能夠從殖民時期脫胎換骨，必須要發展本土資本，並且要透過工業建設擴展經濟，發展民族工業，不能讓宰制印尼經濟的外國資本壟斷國內經濟。

當然這所謂的「外國資本」，包括殖民者與外來的華人。這樣的原則被寫在印尼憲法第33條。

「阿里巴巴」現象

蘇加諾晚年在經濟上更嚴格監管外資公司。這種做法主要是希望透過「土著化」與「民族化」的政策以化解經濟困境。然而這些限制華人經濟活動的政策，並沒有真正使印尼的經濟得到發展，反而使經濟惡化。例如，限制外商與華人經營的「壘壘制」¹，形成所謂「阿里巴巴」(Ali Baba)現象，也就是「土著執照擁有者」(Ali)與「華人企業」(Baba)的商業聯盟關係。

蘇哈托(1967年至1998年任印尼總統)採取的策略是在政治領域禁止以華人身份扮演任何角色，並限制華人文化與教育，阻止華人社會華人化。但是在經濟領域上，其對華人經濟則是採取鼓勵與合作的態度，給予特定商人特權壘壘或政府合約，這樣更助長華人建立政商聯盟的環境。這樣的聯盟關係，就是一種統合的資源分配關係。藉由國家機器「導引」經濟政

策，透過軍隊與政府去政治化的系統性保護，對土著菁英（特別是軍隊與官僚），提供租稅減免、進出口特許執照、特定的開放承諾……等資源，參與合作的華人企業則回報以生意機會或直接利益。這樣的「官僚資本模式」（Bureaucratic-Capitalist）是一種由中央到地方，由蘇哈托到地方官員的全面性結構關係，成為八十年代印尼經濟能夠快速資本累積的主因。

可是這種聯盟的關係只是介乎圖利政府與特定的少數財團之間，並不能夠使多數的土著受惠。土著社會對於華人企業利用「阿里巴巴」快速累積財富的現象，充滿敵意和怨恨。因此，在土著社會中一直有所謂的「反華論述」存在。對多數的印尼土著來說，華人由上而下掌控印尼的經濟，對整個印尼並無向心力；華人與政府勾結致富，所以華人也成為貪污腐化的同義詞。

穆斯林中產對華人不滿

自 1990 年代穆斯林中產階級興起，排斥華人的言論與行為更為增加。這是因為大部分的伊斯蘭教徒認為在這一波經濟成長中，受益的只有華人。而且這批以現代主義為背景的穆斯林中產階級，逐漸對政府偏好華人與基督徒感到不滿。在經濟與宗教的雙重社會背景下，土著社會反華的社會情緒，可以被輕易政治動員。

1998 年的 5 月初棉蘭發生嚴重的反華暴動，延續到 5 月中雅加達街頭示威要求民主化的大學生被維持治安的軍警打死，引發更大規模的暴亂。在這場被稱為「黑色五月」暴亂中，1200 人喪生。在「黑色五月」後，歷經印尼的民主轉型，印尼華人開始可以享受一般國民的平等權益，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與文化，也逐漸在政治上嶄露頭角，在經濟上則繼續保持優勢。不過，儘管印尼自此之後未出現流血的大規模暴力事件，但種族衝突因子仍然存在。老一輩的華人還是有「每二十年一大亂」的陰影，伊斯蘭團體上街抗議還是使華人社群感到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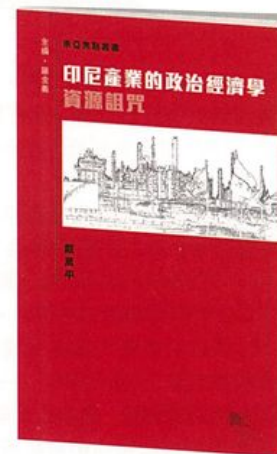
事實上，雖然歷經政治經濟轉型以及面對全球化的開放，外資大量的投入，經濟從金融風暴谷底復甦。中國的興起與「一帶一路」帶來的貿易機會與投資的湧入，結合掌握本土資本的華人，帶動新一批的成長動能。這就是我們今日在印尼各大城市與商場看到的榮景。

可是繁榮背後，還是有大批本土的、多半是伊斯蘭信仰的群眾並沒有因此受惠，1998 年前有關排斥華人的言論與行為並沒有因為政治轉型而有所改變；而當代都市中產階級穆斯林訴求安定，也害怕華人與基督徒當政可能帶來的社會失序；中國資金與遊客的大舉進入令他們感到不安。所以鍾萬學雖然政績看好，在第二輪投票中選票仍未

有增長，得不到主流伊斯蘭社會的支持而落敗。

就經濟面來看，印尼經濟民族主義依舊是整體國家經濟的重要考量，特別是針對境內的自然資源，印尼政府清楚無法永遠只靠出口低附加價值的原礦支撐國家出口。在繁華背後，印尼的工業發展仍受到不同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例如：印尼是產油國家，石油工業卻被國營石油公司把持而無法使國家富強；印尼有廣大的內需需求，卻無法建立完整的汽車產業供應鏈；燃油補貼政策拖跨國家財政。

（戴萬平教授新著《印尼產業的政治經濟學：資源詛咒》即將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出版，編入「東亞焦點叢書」，該叢書由羅金義主編。）



戴萬平教授新著《印尼產業的政治經濟學：資源詛咒》即將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提供）

註¹ 凡是土著資本超過 70% 的企業，即是屬於「堡壘商」（Benteng），政府對於這一類的企業應給予「土著特權」（Indigenous Privileges），享受各種的優惠措施，以促進土著企業的競爭能力。